

赵金刚 著

朱熹的历史观

天理视域下的历史世界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赵金剛 著

◎ 朱熹的历史观

天理视域下的历史世界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熹的历史观：天理视域下的历史世界 / 赵金刚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4
ISBN 978-7-108-06185-0

I. ①朱… II. ①赵… III. ①朱熹(1130-1200)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①B24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17029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装帧设计 薛宇

责任校对 安进平

责任印制 宋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32

字 数 398 千字

印 数 0,001—2,700 册

定 价 75.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序

陈 来

本书是金刚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修改而成的。作为朱子哲学研究的一部分，本书是以哲学家朱子所观察和认识的历史世界为对象，故可属于朱子的历史哲学与历史观的研究。作者认为，一般被典型地归结为朱子历史观的内容如王霸义利之辩、三代汉唐之辩等皆有其哲学基础，朱子对这些历史范畴的观点是基于他的哲学理气论、理势论等而展开的。因此本书首先对朱子哲学中与历史观相关的理气论中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一般朱子哲学研究不同，作者对朱子理气讨论的研究着眼于其中与历史观念相连接而可构成其历史观基础的部分，而这些部分恰是以往朱子哲学研究中未予重视的。作者深入于此，在其中每一问题上都进行了十分细致的分析，呈现了朱子思想的结构、层次和多面性，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得出了确当的结论。如与钱穆等学者重视朱子哲学的“气强理弱”说不同，作者认为，理在本体上强于气，而在具体流行上弱于气，故提出，与气强理弱的表述相对应，在朱子哲学中另一命题亦可成立，即理强气弱，气质听命于义理，从而理气强弱的问题若全面来看乃理气互胜互强，这在修养论上尤其明显。这就使这一理气强弱的问题得到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又如在理生气的问题上，本书提出，从气之生生的角度来看，朱子并未否定理生气说，理之生气不是历史的线性过程，不是专指宇宙初始的产生，而是理无时无刻使气不断产生，理是宇宙之气源源生成的根据。这一认识也是以往研究中所忽略的。

本书还提出，朱子所说的理之主宰分别体现于本体和流行两方面：在本体上，主宰体现为天地生物之心；在流行上，主宰体现为理则和理序。这些分析和主张都深化了朱子哲学的研究。在命的观念上，本书认为朱子不是把命归结为理或气，而是更多强调命是一综合概念，其中有两个不同侧面，而不是有两个可分离而言的命，命在天的层面是理与气在流行过程中统一产生的作用。

在理势问题上，作者认为，朱子思想中的事势、时势强调客观现实层面，理势则兼顾价值与现实，通过理势实现价值和现实的统一。朱子哲学的理势合说之处都是兼理势双方而言，表达了一种价值与历史相互资借的立场。在历史观本体部分，即王霸义利、三代汉唐等问题上，本书都比前人的讨论做了更深的推进，如提出陈亮的王道观念不是从内圣定义而是从外王逆推得来的，认为对陈亮的功利主义定位不能脱离其儒学思想的前提等。

应该说，本书在以上这些问题上的思考和分析都能发前人所未发，在材料的使用和解释分析上，行文辨析的细密亦超过已有的相关研究。在观念的提炼和总结上，也较前人更为深入。本书在许多方面都实现了研究的突破和创新。

总体而言，本书结构合理，文字平实，掌握文献资料广泛，显示了作者基础扎实、学风细致的特点。本书的突出特点是全面和深入，在仔细研读文本、多方面思考其意义的基础上，分析深入、讨论细致，在多数问题上都比现有的研究更为深入、辨析更为精细、把握更为全面，体现出作者已经具有很强的从事创造性研究的能力，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金刚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经过前后9年的学习，系统地接受了中国哲学研究的严格训练，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和开阔的视野。他勤勉刻苦、谦虚问学，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为人诚恳、工作积极，是一位在各方面都很有发展前途的青年学者。毕业之后，金刚对博士论文

答辩稿进行了修改、调整 and 补充，使得这一研究成果较前更为完善。现在他的论文即将作为专著出版，我在表示祝贺的同时，希望他今后继续努力，争取在学术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2017 年 7 月 30 日

目 录

序 陈来 1

导论 1

第一篇 理与气

第一章 理一分殊 19

第二章 理气强弱 33

第三章 理生气 53

第四章 主宰谓之帝 76

第五章 气运之不齐 99

第六章 德与命 121

第二篇 理与势

第七章 理与天下之势 167

第八章 理势 178

第九章 损益 205

第三篇 王霸义利

第十章 心事、经权 233

第十一章 以义为本 270

第十二章 尊王贱霸 296

第十三章 道物心法 321

第四篇 三代汉唐

第十四章 学统·道统与历史 337

第十五章 回复三代 362

第十六章 汤武革命 395

第十七章 《通鉴纲目》与正统 416

第五篇 本朝

第十八章 祖宗·变法·道学 435

第十九章 朋党：君子小人 463

结语 492

参考文献 496

后记 502

导 论

张岱年先生指出：“中国古代哲学中，从孔子以来，即有关于历史观的言论，司马迁说过‘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对于古代哲学家学术宗旨的简明概括。‘通古今之变’即是历史观的内容。”^{〔1〕}中国古代史学的发达，与其背后蕴含的深厚的历史意识有着密切关系。古代哲学家关于“形而上”和人生意义的思考以某种形式影响到人们对于历史世界的思考。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可说是世界上一个史学最发达的国家。中国人很早便知道记载历史，这即证明了中国人很早便懂得观察人生。能了解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才能开始有历史记载。”^{〔2〕}钱穆先生的这一观点进一步说明了对价值世界的思考与对历史世界记录的关系。联系张先生所讲，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对哲学问题的观察，可以纵贯于对历史世界的理解之中。

朱熹，字元晦，后世尊称为“朱子”，宋明理学之集大成者，自南宋以降，其思想影响着整个东亚世界。朱子对“天人之际”求索不断，著述极其丰富，哲学体系“致广大而尽精微”，对朱子哲学的研究也成为现今中国哲学研究的“重镇”，有很多深入的研究成果。

关于朱子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朱子语类》《文集》中有大量的关于历史的讨论，朱子本人十分关注宋之前以及其当代的历

〔1〕 张岱年：《王船山的理势论》，《张岱年全集》第五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第655页。

〔2〕 钱穆：《中国历史精神》，台北：兰台出版社2002年2月，第12页。

史问题；第二，据汤勤福先生统计，仅《朱子语类》当中就涉及 124 种史书，朱子广泛阅读了各种各样的历史著作，对史书的关注可见一斑^{〔1〕}；第三，朱子本人的著作中，也有很多直接就是我们今天认为的历史著作，如《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八朝名臣言行录》，这些写作也是朱子独特关怀的表达。可见，“史学”在朱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当中占有一席之地。

然而在以往的哲学研究中，我们对于朱子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本体论、心性论、工夫论、境界论等范畴之下。在原有的研究体系下，朱子的历史观很难得到安顿，只是在谈论心性论和工夫论时会偶尔涉及。相比于对王夫之的历史观的研究，朱子的历史观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但是，如果我们忽视朱子的历史观不谈，就很难全面把握朱子思想的全貌，也很难把握朱子建构的形而上的哲学体系的最终关怀与落脚点在何处。黑格尔认为，普遍本质必须“下降”为个别化的东西，才能成为现实。如果我们进一步去了解朱子对现实社会历史的关照，可能会丰富我们对朱子讨论的“普遍本质”的认识。

朱子的历史观是由条条经纬构成的，这些线有着共同的指向，却不是这个指向在时间中的自我展开（如黑格尔）。本书处理朱子的历史观或历史哲学并不是试图发现朱子有没有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而是试图用“分析的历史哲学”的方法揭示朱子眼中的历史世界的模样与轮廓。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副标题才定为“天理视域下的历史世界”。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有意避免线性的逻辑建构，而是以理气为骨架，以理势为经络，以具体问题为血肉，采取从抽象原则到原则的具体落实的写作模式。实际上我们会发现，理势问题是理气问题的延伸；王霸义利问题关系到理在历史政治当中扮演何种角色、对理的

〔1〕 汤勤福：《朱熹的史学思想》，济南：齐鲁书社 2000 年 1 月，第 108 页。

追求对于历史世界有什么意义；在三代与汉唐的分判中，学是关键，而学恰是重新认识理的关键，学最终指向理；而朱子之所以强调本朝的重要，就在于本朝出现了道学，为天理的实现创造了可能性的必要前提。可以说，所有问题的最终解决都需要汇聚到理气关系中，所有问题也会以某种形式化归为理气问题，理气问题是一切问题的中心与灵魂。

在分析具体问题之前，我们还有必要对相关“先行”问题进行分析，这些问题关系到本书论述的基础，尤其是本书整体内容的合法性，也是对上述概括的一个补充说明。

一 历史、历史观与历史哲学

（一）中国视域下的历史哲学问题

本书标题为“朱熹的历史观”，标示了本书的研究范围，即希望对朱子哲学思想中的“历史观”进行专题研究。在这里我们还需要对相关问题有所说明，对本书讨论的问题进行必要的“交代”，尤其是研究的“合法性”问题。

一些思想家，如黑格尔，认为中国虽然历史记载丰富，却不承认中国具有“历史哲学”。有一些学者，虽然承认中国具有历史哲学，却认为中国的历史哲学很晚才产生。如余英时将章学诚看成是中国第一位历史哲学家，并将之与柯林武德进行比较。^{〔1〕}国内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哲学也常将研究重心放在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身上。较早的历史思想，在哲学界缺乏适当的地位，对他们的研究往往在“史学史”研究范围下作为一个附属问题进行处理。如果按照这些观点来看，那么“朱子的历史哲学”这一说法就不具备问题的合法性，甚至可能被质

〔1〕 见余英时：《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一文，收入氏著：《论戴震与章学诚·外篇》，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年 1 月。

疑为“伪命题”或者“构造”出来的问题。

但是，在实质上，这一问题与“中国有没有哲学”这一问题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如果我们以某一种哲学标准来看中国古代思想，我们完全可以否认中国具有哲学；同样，如果我们采取西方某一种历史哲学标准（如黑格尔对历史哲学的定义）来看待中国古代思想，我们也可以否认中国古代具有历史哲学，否认朱子具有历史哲学，甚至可以否认章学诚是历史哲学家，否认王夫之有历史哲学。

如果将这一标准极端化，我们会发现更为“吊诡”的现象，即如果把审视中国思想的标准用在西方思想自身，我们会发现“历史哲学”在西方也会有合法性危机。按照西方历史哲学的某一标准去看待其他思想家，完全可以否认他们具有“历史哲学”。比如，如果按照伏尔泰以后的思想家的观点，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历史神学”不是“历史哲学”；如果按照晚近英美流行的“批判的（分析的）历史哲学”来看，就不能承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真正的历史哲学，甚至一切“思辨的历史哲学”都不是真历史哲学。

实际上在西方，“历史哲学”本身就是一个多义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本身也是变化的。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历史哲学主要根据人性的一致性去探讨历史的一致性，维科和赫尔德则更重视文化背景与历史的关系，黑格尔强调“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马克思主义则强调经济基础的地位。晚近发展出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则与前述趣味迥异。^[1]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概述了西方三种历史哲学看法，而他本人则采取了与之不同的第四种观点。^[2]可见，即使在西方哲学内部，我们也很难发现某种固定的“历史哲学”定义。如果考

[1] 关于西方整个历史哲学的发展，可以参考张文杰、何兆武：《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七卷历史哲学）·导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张文杰《历史的话语·译文集序》（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

[2] 见[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导论》，第1页。

察西方“历史哲学史”，我们还会发现，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分支，一般把意大利人维科看作西方历史哲学之父，而“历史哲学”这一概念在西方本身就晚出，直到法国思想家伏尔泰那里才第一次使用了“历史哲学”这一概念。那么，我们是否一定要否认维科、伏尔泰之前有“历史哲学”呢？我们会发现，“历史哲学”这一概念，是西方某些思想家意图将自身思想与“神学”相区分的产物，也是西方思想家区分“自然”与“社会”的结果。“历史哲学”就概念来讲具有其特殊的思想史内涵，但是许多西方研究者并不因为这一概念自身的发生史而否认之前的思想家具有“历史哲学”。退一步讲，即使认为某些哲学家没有“历史哲学”，也不能否认他具有“历史哲学思想”。以古希腊为例，西方普遍认为，古希腊人历史感较弱，古希腊没有历史哲学，但在古希腊那里已经有了“历史哲学思想”，而且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独特性。^{〔1〕}

如果对待中国问题不采取双重标准，我们似乎也不应该对中国是否有哲学、中国是否有历史哲学产生过多的质疑，关键看我们以何种态度对待“历史哲学”，在相关研究中如何把握置于“历史哲学”下的一些问题。

（二）历史与历史哲学

在“历史哲学”这一概念上，还有另一个“麻烦”需要去面对，那就是“历史是什么”。与“哲学”一样，“历史”同样是一个难以定义的概念。但是，如果我们以历史哲学为研究对象，却不对“历史”进行相关界定，我们的研究似乎就有些“无的放矢”。冯友兰先生认为“所谓历史者，或即是其主人翁之活动之全体，或即是历史

〔1〕 参见刘小枫：《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中译本导言》，载〔德〕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5月，第12—13页。

家对于此活动之纪述”^{〔1〕}。沃尔什指出：“‘历史’一词本身是模棱两可的。它包括（1）过去人类各种活动的全体，以及（2）我们现在用他们所构造的叙述和说明。”^{〔2〕}李秋零先生更是进一步地对历史本体、历史叙述与历史认识进行了区分。^{〔3〕}历史哲学产生的一个前提是“自然”与“社会”的区分，这一前提本身就与对历史的理解有关。在这一前提下，笛卡儿将历史逐出哲学的领域不予研究，而伏尔泰等人则将历史作为一个专门的问题进行对待。西方历史哲学也常讨论一个问题，即历史领域与自然科学领域究竟有没有关系，二者的原则是否一致。似乎在这样的问题之下，历史首先表现为与自然的区分，是社会领域的特殊问题。但也不尽然，如果我们以康德为例，就会发现问题的复杂性。在康德看来，“人类是自然界的一个部分，其历史也是自然过程的一个部分”，“历史在康德看来不外是自然实现其‘最终目的’乃至创造的‘终极目的’的过程”^{〔4〕}。当然，关于历史还有各种不同的定义，但是似乎每一种关于历史的定义都会牵扯出其他问题需要解释，我们对于历史的界定很容易陷入某种“无限倒退”。

那么，面对历史，我们是否找不出某个公共的“点”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呢？在“含混不清”的历史面前，我们如何理解“历史哲学”？本文无意对这些问题进行专门的理论分析，在这里笔者只想交代本书在诸多“模棱两可”面前采取的一些态度，以及由这些态度界定出来的相关问题。

首先，历史是属人的。钱穆先生讲：“历史便即是‘人生’，历史是我们全部的人生，就是全部人生的‘经验’。”^{〔5〕}尼采在《历史的用

〔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1页。

〔2〕 [英] 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6页。

〔3〕 李秋零：《德国哲人视野中的历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2页。

〔4〕 同上书，第85页。

〔5〕 《中国历史精神》，第5页。

途与滥用》一书的开始专门分析了人与动物的差别——动物只是活在“此刻”，而“人对他自己也感到迷惑——他无法学会忘记，而总是留恋于过去”^{〔1〕}。可以说，面对过去而思，恰恰是人区别于动物来讲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历史是属人的，一方面由于只有人才是思考历史的主体，另一方面也由于历史对人有独特的意义。

从西方“历史哲学”史的演进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科学的关系一直是西方历史哲学家关注的要点，尤其是自然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的关系，更是其中的焦点问题。西方历史哲学家，关注的是自然规律与科学规律能否适用于人类社会、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否有其独特性等诸多问题。那些将历史社会与自然相分离的历史哲学家（如维科）更强调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独特性。即便是那些将二者连接起来的哲学家（如实证主义者），他们想做的也是希望用理解自然的方式最终去理解人类历史。^{〔2〕}对历史的着眼点始终是“人”。

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古代哲学强调天人合一，很少将自然与社会截然二分。例如古人讲“究天人之际”“通天道以明人事”，都是把天人看成相互连接的整体，进而思考相关问题。“自然”与“社会”的“紧张”在中国古代思想中似乎没有那么明显。这也反映在朱子对于历史世界的理解当中。朱子在进行相关论证时，并没有将“自然”和“社会”的区分看得太重，虽然有些问题在人或者自然那里会有不同表现，但在根源上，二者却有很多一致性。朱子并不刻意区分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二者在很多规律上是一致的，他经常举自然当中的例子来论证一些道理，而这些道理在人事上同样适用。这样，我们在研究朱子的历史世界时就不得不涉及很多“自然”的东西，这就与某些西

〔1〕〔德〕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第1页。

〔2〕英国当代历史哲学家沃尔什在《历史哲学导论》第二章《历史学与科学》中专门讨论了西方历史哲学家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对于相关问题，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精神》第一讲《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中亦有所涉及。

方历史哲学家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如此，探究天道终究是为了明人事，对“自然”的研究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社会”，在最终目的上，人依旧是占主导地位的，“历史世界”终究是人的世界。自然化的历史中体现的道理，也是为了解释人事。在朱子那里，历史在根本上还是属人的。

其次，“历史哲学”是主体面对历史的整体态度与原则。在谈到西方历史哲学，特别是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产生时，沃尔什指出：

在这段时期里，人们所设想的研究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辨。它的目的是要达到把历史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是要表明尽管历史呈现出许多明显的不规则和不连贯，它却可以被看作是形成为体现出一种全盘计划的整体；而这个计划，我们一旦掌握了它，就既能阐明各种事件的详细过程，又会使我们把历史进程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上看作是能满足理性的。^{〔1〕}

可以说，正是有一种对于历史的整体感，才会产生历史哲学。对历史片段化的解释和理解，并不能上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许多关于史学的理论并不等同于历史哲学。我们有对于历史的“意见”，并不等于我们有“历史哲学”。我们强调对朱子“历史世界”的理解，正是要面对朱子对待历史的整体态度和整体原则。

但是，在很多人看来，中国古代思想家面对历史似乎不具备这样的“整体”。这其实又回到了“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上。在这里，我们可以讲，中国古代某些哲学家可能没有“形式”上的整体，但有“实质”上的整体。而对其实质上的整体的把握，将其“形式化”，可以说是我们现代研究者的使命。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哲学家没有西方形式上的历史哲学，但是有实质的历史哲学。这一区分建立在冯友

〔1〕《历史哲学导论》，第3—4页。

兰、张岱年两位先生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之上。

冯友兰先生认为：

所谓系统有二：即形式上的系统与实质上的系统，中国哲学家的哲学虽无形式上的系统，但如谓其无实质上的系统，则即等于谓中国哲学不成东西，中国无哲学。形式上的系统，希腊较古一点的哲学亦无有。苏格拉底本来即未著书。柏拉图之著作，用对话体。亚里士多德方将其所研究分为政治、伦理等部分，每部分皆有条理清楚之论文讨论。按形式上的系统说，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较有系统。但在实质上，柏拉图的哲学，亦同样有系统。依威廉·詹姆士说：一大哲学家必有其自己之“见”，以此“见”为中心，而推而应用于宇宙之各方面。应用愈广，则其哲学系统亦愈大。故大哲学家之哲学，皆如枝叶扶疏之树，其中首尾贯彻，一切皆是一片。故一哲学家之哲学，如可称为哲学，则必须有实质的系统。所谓大哲学家之哲学系统，即指其实质的系统也。中国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及西洋哲学家，而实质上的系统则固有也。^{〔1〕}

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序论》中对此问题也有类似阐发，此处不再赘述。^{〔2〕}如果套用冯、张两位先生的话，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没有西方形式的历史哲学，但是具有“实质的历史哲学”，我们今天的研究或许是要将这实质的历史哲学用一定的方法展现出来，展现为一定的“形式”，突出其中的某些问题。而这一“形式”的展现，则是我们在这一时代不得不做的工作。张岱年先生在分析中

〔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第10页。

〔2〕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张岱年全集》第二卷，第2—3页。